



.....

新世纪文论

余三定 等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 · · · ·

新世纪文论

余三定 等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世纪文论 / 余三定等著.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8

ISBN 978 - 7 - 305 - 05113 - 5

I. 新… II. 余… III. 文艺理论—文集
IV. I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31023 号

出版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press.nju.edu.cn>
出版人 左 健

书 名 新世纪文论
著 者 余三定等
责任编辑 赵 庆 编辑热线 025 - 83596027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南京京新印刷厂
开 本 787×960 1/16 印张 27 字数 510 千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05113 - 5
定 价 49.00 元

发行热线 025 - 83592169 025 - 83592317
电子邮箱 sales@press.nju.edu.cn(销售部)
nupress1@public1.ptt.js.cn

-
-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序

余三定

湖南理工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是一个实力较强的专业,该专业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和本世纪初期两次被确定为湖南省重点专业。文艺学学科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重要依托和支撑点,湖南理工学院文艺学学科具有明显的优势,其师资力量、科研水平、教学能力都达到了较高的层次。该学科于 2004 年被确定为湖南理工学院重点建设学科,于 2006 年被确定为湖南省重点建设学科。

湖南理工学院文艺学学科在 20 世纪 70 年代由李元洛教授开创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由李凌烟教授领衔建设,至今走过了 30 余年的建设、发展途程,已经具有了较为深厚的学术积淀,形成了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学、当代学术史研究等主要研究方向。进入新世纪以来,该学科教师先后完成了“中国的文学悲剧论”(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余三定主持)、“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文学人物形象研究”(省社科规划课题)、“屈原学大典”(省社科规划重点课题)等多项课题;发表论文 100 多篇,其中被《新华文摘》转载 4 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 1 篇,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 3 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 20 多篇;该学科老师主持的教改课题先后多次获得国家级和省级教学成果奖,其中“开展公共艺术教育,为中学素质教育培养新型师资”(李凌烟主持)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该学科老师有 2 人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有 1 人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有 1 人被评为湖南省优秀中青年专家和首届湖南省普通高校教学名师;等等。

湖南理工学院文艺学学科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学科发展特色,主要表现为下述几个方面。其一,将文艺理论研究和文学创作实践的批评相结合,热忱关注地域文学创作现象并长期坚持作追踪评论与理论研究。多年来该学科在推动文学湘军尤其是岳阳文艺创作上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文坛岳家军论》(余三定著,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便是对岳阳文艺创作颇为全面系统的考察与评论。其二,适应社会

目 录

序 余三定/1

余三定小辑

- 当代文学缺少鲜活的贪官典型/3
- 中学语文教材的解构与重建——《星星》等报刊的争论综览/8
- 文学批评学的新开拓/18
- 对残酷与死亡的艺术描写——评周实《刀俎之间》/19
- 摄影文学：大有作为的学术研究处女地——答《文艺报》记者于烈问/22
- 理想主义的深情歌赞——评长篇小说《潜流》/28
- 关注现实 关怀民众——序张克明《艺术批判与审美超越》/30
- 为了生命的丰富而写作——评谭仲池散文/33
- 当代知识分子人格失落的悲剧——评长篇小说《沧浪之水》/38
- 学者写散文的动因/43
- 日常生活的诗意升华——评夏瑞虹散文集《触摸生活》/44
- 建立摄影文学学的思考/46
- 思想·学术·文学——评熊元义《拒绝妥协》/51
- 史事·文学·识见——评《风雨龙舟》/58
- 关注现实——评《拒绝妥协》/60
- 文学创新必须积极面对现实/61
- 文学批评的信念与学理性/67
- 喜相识·深相交·多相助——《文艺报》帮助我不断进步/72
- 善良人性的魅力和永恒——评薛媛媛《雕花床》/75
- 追寻理想主义的爱情——评《捧着爱情的鲜花走向坟墓》/77
- “英雄”的新写法：由写“壮举”到写“日常”——评周文杰的《戴碧蓉》/79
- 科学存在观与当前文艺批评/83
- 社会的解放与人的解放——康濯中篇小说《水滴石穿》新论/85
- 纷繁复杂生活的真实再现——评长篇小说《出山三天的美女》/89
- 道义意识·参与意识·创造意识——我看作家的社会责任感/91
- 当下农村生活的独特挖掘——评黎晶小说集《只会种儿子》/95
- 匠心独运 别具创意——评何泽中对毛泽东对联的研究/99

- 2005年：文学批评的“批评”/101
回眸2005年的文学评论热点/106
女性文学的新探索——评蒋晓丽《女人的飞翔》/114
别具创意的科普作品——评《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中的自然科学》/116
附录：余三定“当代学术史研究”论文目录/118

谭解文小辑

- 样板戏过敏症与政治偏执病/123
关于《金光大道》的几点思考/127
“潜在写作”与当代文学史的客观性/134
论毛泽东的诗学观/140
读顾骧《晚年周扬》断想/147
《李白与杜甫》三题/154
当代学术史上值得记述的一页——回顾四十五年前关于《再生缘》的讨论/162
附录：谭解文其他论文目录/168

张恒学小辑

- 白鹿·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理想的象征——再论陈忠实的《白鹿原》/171
文学人物形象：世纪之初的文学关怀——来自“世纪之交中国文学人物形象研讨会”的理论思考/177
魂兮归来，中国的文学精神/184
论世纪之交的反腐小说/188
“革命历史图景”的别一种文学阐释——评杨厚均的《革命历史图景与民族国家想象》/198
拿什么来拯救悲剧？——读北村的《愤怒》/204
附录：张恒学其他论文目录/212

杨厚均小辑

- 被误读的和被戏耍的/215
革命话语中的五四想象/217
中国现代乡村小说的反现代性倾向/225
文学作品中的英雄形象与现代性想象/231
革命历史记忆从何而来？——新中国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历史叙事分析之一/236
革命历史的“现在性组织”——新中国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历史叙事分析之二/244
世俗体验与恐惧逃离——“十七年”革命历史长篇小说中的狂欢化图景分析/251
附录：杨厚均其他论文目录/260

朱平珍小辑

- 钱海源美术评论的风格/263

- 凌烟阁三趣/266
- 生命属于每个人只有一次——观电视连续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268
- 新批判主义述评/270
- 多样性·批评性·学术性——评《文艺湘军百家文库·文艺评论方阵》/281
- 努力开拓新的研究领域/290
- 人生和艺术的“朝圣者”/292
- 播种阳光的人/294
- 当代中国乡村的“娜拉”——评小说《寻找妻子古菜花》/296
- 理论气魄与史家眼光/299
- 当代长篇小说艺术世界的结构图——读《史诗类型与当代形态》/301
- 苏格拉底与孔子的成人艺术比较/303
- 黑猫:病态人格的象征——论爱伦·坡的短篇小说《黑猫》/320
- 浅论《人间词》的“有我之境”及词人之死/325
- 文学与人生的和谐之乐——陈昌本创作论/329
- 简论李元洛的诗歌评论/335
- 人生哲理的艺术象征——评美国短篇小说《所有好处》/340
- “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论外国电影《音乐之声》与《美丽人生》中的游戏/343
- 数量少·层次浅·模式化——论中国电影中教师形象塑造的不足/347
- 附录:朱平珍其他论文目录/356

任先大小辑

- 试比较宋代诗学的“熟读”与英美新批评的“细读”/359
- 严羽的“兴趣”说与退特的“张力”论/365
- 严羽“兴趣”说新探/370
- 20世纪国内严羽研究述评(上篇)/375
- 20世纪国内严羽研究述评(下篇)/383
- 梁章钜《楹联丛话》的诗学研究/391
- 论吴恭亨《对联话》及其理论价值/399
- 论唐湜的诗歌理论/403
- 当代学术史研究的可喜收获——评《学术的自觉与学者的自立:当代学者研究》/409
- 二十年文艺研究的一面镜子——评《文艺湘军百家文库·余三定卷》/412
- 整体推进 争显风流——岳阳师院中文系近十年学术研究述评/416

欧孟宏小辑

- 8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的回顾与前瞻/421

余三定小辑

余三定 1956年生,男,湖南岳阳人,现为湖南理工学院党委副书记、中文系教授、《云梦学刊》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学和当代学术史。

当代文学缺少鲜活的贪官典型

严格地说起来,本文的论题(标题)也许是不甚确切的,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有不少作品写了反贪内容,自然也描写了贪官形象,如此看来,贪官形象似乎没有缺失。但是,当我们逐一检视、分析起来看,那些有代表性的作品中的贪官形象有哪些立得起来并让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呢?有哪些血肉生动甚或富有典型意义的呢?我们不能不遗憾地回答:没有。有的不过是些侧面、表层描写的单薄、肤浅的形象,或者是过于漫画化的形象。正是从这样的意义上我们不得不说,贪官形象缺失是20世纪90年代文学的一个重要不足。

生活向文学提出了要求

新时期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随着思想解放的推进、社会的发展、改革的深入,我们的文学曾留下了若干无愧于时代的、可以载入当代文学史册的、让人耳熟能详的文学形象,例如“伤痕文学”中的谢惠敏、宋宝琦(《班主任》)、王晓华(《伤痕》),反思文学中的月兰(《月兰》)、李顺大(《李顺大造屋》)、王老大(《笨人王老大》)、许灵均(《灵与肉》)、罗群(《天云山传奇》)、李铜钟(《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改革文学”中的乔厂长(《乔厂长上任记》)、李向南(《新星》)、冯△爸(《乡场上》),“寻根文学”中的丙崽(《爸爸爸》),还有无所作为的知识分子形象倪吾诚(《活动变人形》)、勤劳的老农民形象许茂(《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积极进取的青年农民形象金狗(《浮躁》),等等。这些文学形象与他们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社会世像的深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的身上典型地概括了某一社会历史时段或某一社会生活侧面的基本特征和本质特点,至今以至往后,人们谈起那时的某一社会时段或某一社会生活侧面时,会自然提到这些文学形象,这些文学形象具有独特的概括意义和标志意义,也即是典型意义。

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逐渐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场深刻的变革,它既是经济运行方式、运行机制、管理体制等方面的转变,又必然伴随着思想观念和价值追求方面的变化。在这个特殊的时期,社会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腐败现象(与此同时,我们党开展了长期而愈来愈有力的反腐败斗争)。“腐败”,按《辞海》的解释是“腐烂”。“也泛指败坏、堕落。”但今天实际是专指

利用职权假公济私的行为。贪污是腐败的核心,也是其主要表现形式。当今社会比较严重的腐败的标志,就是产生了为数不少的大大小小的贪官。且贪官的出现明显地表现出两个趋势:一是人数逐年增加,职务级别越来越高。据《广东支部生活》1998年第11期提供的资料,全国查处的贪官(包括受党纪政纪处分和刑事处分者)1993年厅局级69人、省部级3人,1994年厅局级87人、省部级5人,1995年厅局级429人、省部级24人,1996年厅局级490人、省部级13人,1997年上半年厅局级598人、省部级33人。在2000年,大贪官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先后被判处死刑,可谓触目惊心。二是领域扩大,金额增多。贪官的腐败已由经济领域发展到人事领域、司法领域;90年代初期大贪官贪污受贿的金额主要以万元、十万元计,90年代中期主要以百万元计,90年代后期则发展到千万元甚至更大的数字。

江泽民同志早在1993年8月21日在中共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中就严肃指出:“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要足够估计到这种形势。这股风来得很猛。”可见,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我们党,从90年代初起就对腐败现象、对贪官给予了高度警惕并一直进行着坚决斗争。我们的理论界、新闻界、舆论界乃至整个社会,对腐败、对贪官也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进行着不懈的斗争。我们的文学却在这方面表现出了某种淡漠和忽视,这不能不说是令人十分遗憾的。

反贪题材的深化

我们说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对贪官表现了不应有的淡漠和忽视,并非说文学没有去表现这种社会现象,而是说其描写太表层、肤浅和新闻化。我们说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中的贪官形象缺失,并非就其数量而言(单就数量上来说,有不少文学作品都写到了贪官),而是就其“质量”而言,就是说文学作品中的贪官形象大多是单薄、苍白的。我们来看一些有代表性作品中贪官形象的描写。

一些文学作品把贪官的腐败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描写,但也仅仅是作为一种现象来描写,即是说作品是在描写当代纷繁复杂社会生活时,把贪官作为这复杂社会中的人给予侧面描写,对贪官的腐败行为则作一种“剪影”、“素描”式的勾勒。《废都》(贾平凹)对腐败行为主要是引用一些新式民谣来表现,给读者留下的仅是一种粗略的概貌和氛围,并无具体的贪官形象。90年代末期某部专门描写官场的长篇小说,描写了当今官场里的种种官员形象,其中也包括贪官形象,但由于作品是通过一位省级机关小官员的视角来描写,故贪官形象仅留下剪影和侧影,没有立体感。长篇小说《玩古》(彭见明)颇为生动地描写了某地区副专员的受贿,到了晚上,去副专员家送礼的人一拨又一拨,以至作品主人公东方冉在楼下树影里躲了一

晚,竟没有抓到一次送的机会,直至第二天早晨副专员即将出门上班的那一刹那,东方冉才瞅准机会如愿以偿送出手。这样的描写固然幽默、精彩,但也给人漫画化的感觉。

一些文学作品专门描写反腐败(反贪)的斗争,相当成功,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果,如张平的长篇小说,这在当代文学史上将会留下深深的印记。张平的反腐败(反贪)文学集中笔力表现“反”(贪)的必要性、艰难性、正义性以及“反”(贪)的错综复杂、生死搏斗,读起来使人感到惊心动魄、荡气回肠,作品塑造了不少感人的反贪英雄形象,如刘郁瑞(《天网》、《刘郁瑞办案记》)、李高成、杨成、万永年(《抉择》)、罗维民、何波(《十面埋伏》)等等,这些人物极少那种概念化、模式化、脸谱化的东西,不仅可敬,而且可亲、可信。但作品描写的所“反”的对象——腐败分子(贪官)则给人单薄的感觉,作品的贪官形象大致都突出地表现出两方面的特质:一是坏,二是狡猾,缺少复杂的人性深度和厚度。有的评论家把张平的作品归结为政法题材,虽然有些偏颇(张平的作品并非单纯的政法题材),但也可以理解,因为张平作品突出的是与犯罪分子(腐败分子、贪官)的斗争(斗志、斗勇、斗智、斗力),突出的是错综复杂、长期曲折甚至是扣人心弦的“斗”的过程,或者说是惊险的破案过程。

把贪官的腐败行为过多地归结为个人道德上的原因,是不少作品的共同特点。《苍天在上》(陆天明)中的腐败集团来自于章台市林中县田姓家族。田副省长就出自于此家族;到了省里,更是构成了一张田姓官僚网络体系。这种封建的帮派体系——家族集团本有着深深的社会渊源,但作品主要着力的是道德上的谴责。《中国制造》(周梅森)揭露出平阳轧钢厂从8亿的预算,搞成12亿的规模,可好多年过去了,竟然一寸钢也没有轧出来。厂子光请客送礼一项就是67万多元。工人们有432万元集资款投了进去,烈山县干部竟然以入股的名义倒卖国有土地使用权。作品里道德的义愤溢于言表。《抉择》里的贪官省委副书记严阵等给人印象特别深刻的亦是其道德的堕落、贪欲的膨胀。90年代以来,官员为什么会腐败(贪污受贿),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官员腐败,为什么腐败到如此程度,为什么能够实施腐败(即贪污受贿得逞),怎么从根本上扼制乃至解决腐败问题?显然,单纯从道德和道德约束上寻找原因是无济于事的。

可见,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作品在描写贪官时,或者只作侧面剪影式的反映,或者浓墨重彩于对贪腐案件的侦破过程,或者单纯着力于对贪官的道德上的拷问和谴责,因而我们难于见到立体的、血肉生动的贪官形象。

当代文学人物画廊要求艺术典型

那么,怎么样使我们的反腐败(反贪)文学对社会现实的反映不断深化,怎么样

去努力描写出血肉生动、有立体感的贪官形象,以与时代相呼应呢?笔者以为,下述几方面是值得我们探讨的。

我们可以尝试正面甚至在有的作品中主要描写贪官形象。我国古代的反贪文学可以给我们有益的启示。先秦的诗歌,就有反贪的内容,如夏时的《五子之歌》(载于古文《尚书》),西周时的《诗经·魏风》中的《伐檀》、《硕鼠》,等等,是讥刺贪鄙的名作。此后反贪文学绵延不绝,到宋时产生了众多的反贪谚语和诗歌,宋海盗郑广于投降后作官的《上众官诗》就颇为有趣而深刻:“郑广有诗上众官,文武看来总一般。众官做官却做贼,郑广做贼却做官。”(岳珂《史程》)继而发展到元杂剧中的反贪戏、明清时期的反贪小说,可以说具有丰富的可资借鉴的文本和经验。明清小说中就有专门正面描写贪官的作品,这些作品塑造出了至今不被忘记的贪官形象。明末陆人龙著的《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就是一部专门描写大贪官魏忠贤的长篇小说,作品对大贪官的魏忠贤出生,钻营发迹,疯狂贪贿(魏手下的走狗亦贪赃成性),以及为了贪贿而借“反贪”去残酷迫害正直官员,等等,都有细致生动的描写。作品描写的魏忠贤是一个立起来了的贪官形象。清代小说《儒林外史》(吴敬梓)、《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吴趼人)、《官场现形记》(李伯元)、《何典》(张南庄)等作品都有不少对贪官的正面描写,塑造出了多个各具性格的贪官。上述文学作品值得引起我们思索的是,我们的文学作品,可以侧重于“反”(即重点在“反”)的描写,也可以侧重于所反之“贪”的描写(即重点在对“贪”的展露、挖掘),当我们把“贪”展露得淋漓尽致,把“贪官”描摹得形神毕肖时,或许才能更好地去“反”,更有利于我们去“反”。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只要有“官”的社会便会有“贪官”。中国过去就有过“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说法,可以说中国封建社会是腐败(贪官)滋生的沃土。当今其他国家亦有贪官,据新华社驻华盛顿记者翟景升报道,总部设在德国柏林的“透明国际”(the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1998年9月22日在华盛顿发布了1998年国际腐败洞察指数(这里“腐败”的定义是滥用公共权力来为私人谋利)。这个指数是10多项调查的综合,得分越低腐败情况越严重。中国大陆1998年得分3.5分(最高的丹麦为10分),在他们所调查的85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52位(1997年排名第41位),这就是说还有若干国家排名在中国之后。现在我们的问题在于,当现代化的巨变将中国社会推向一个新的时期之际,腐败并未稍减,反而愈演愈烈。其深层原因何在,能单用道德原因作出回答吗?贪官的形成仅仅是由于道德上的原因吗?问题恐怕没有这么简单。

江泽民同志在《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1997年9月12日)中指出:“反对腐败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反腐败要“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通过深化改革,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可以说,在文学创

作中,把贪官单纯归结为道德的原因,单纯进行道德上的谴责,是只看到了“标”,而忽略了“本”。

可喜的是,当历史进入 21 世纪之际,我们开始见到了一些描写贪官较为成功的力作,我们见到了一些初具立体感的贪官形象。2001 年新春佳节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在黄金时段播放的 20 集电视连续剧《大雪无痕》(陆天明编剧),塑造的贪官副市长周密就并非简单的反面形象,他出身贫寒,靠自己的努力奋斗一步步在仕途上前进,当上副市长后,他也曾想干一番事业,但由于没有经受住巨额金钱的诱惑,走上贪贿乃至杀人的犯罪道路。促使周密堕入深渊的有多种复杂因素,这里有个人的原因也有社会的原因,有道德的原因也有体制的原因,有软环境的原因也有硬环境的原因。周密的发展有一个复杂的心路历程。周密一方面是贪婪的、工于心计的(为了向上爬可谓绞尽脑汁),同时又在一定情况下实实在在地干事业,并且追求着真诚的爱情。长篇小说《财富与人性》(毕四海,载《中国作家》2000 年 12 月号,并同时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单行本)不是一般地揭露腐败、贪官,而是着力揭示贪官的灵魂世界,挖掘人性的深度。评论家张韧评论说:“《财富与人性》由新的犯罪结构网带来新的人物,人物谱系呈现了新的面孔。小说的着眼点不是步步惊险地破案,而是对为什么犯罪的人性拷问。这部小说探究的是人性的整体结构,挖掘人性包孕的多种成分和它们之间对应的矛盾关系。这是这部书的一个重大突破。”评论家雷达说:“《财富与人性》则超越了故事或案件表层的时空意义,把笔触伸向了信仰、价值、生存意义、人性善恶、官场现状、世态人情等等内容。”作家高洪波说:“孟广太这个人物骨子里的东西都被作家挖掘出来了,林之文、毕天成也是如此,都具有相当的人性深度。他们人性的复杂包含了腐败的根源:历史的、文化的、经济的、体制的都有。尤其是他们表现出来的封建性与腐败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更是这部书的发现,这是一个突破。”(以上引文均见《光明日报》2001 年 1 月 18 日)。

上述是一个可喜的开端,但也仅仅是一个开端。因为其虽然较为成功,但只是塑造了某种类型的贪官。现实生活是复杂的,贪官也是各种各样的,而且是发展变化的,我们期望我们的文艺作品尽可能多地既描形又传神地留下贪官的立体的、有血有肉的画像,既为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增添新的成员,更为警示世人和后人。

(原载《文艺报》2001 年 3 月 10 日,《作家文摘》3 月 27 日,《新华文摘》2001 年第 6 期等摘要,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2001 年第 8 期转载,并收入漓江出版社 2002 年 1 月出版的《2001 中国年度文坛记事》)

中学语文教材的解构与重建

——《星星》等报刊的争论综述

一、争论的背景与发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事业成就卓著,这是有目共睹的。但不容回避的是,教育观念、人才培养模式、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还存在相对滞后的问题,不能完全适应面向 21 世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提高国民素质的要求。因此,教育、教学改革的呼声一直不断,且愈来愈强烈,进入 90 年代中期后社会特别强调素质教育,1999 年 6 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可见,教育、教学改革体现了时代要求和历史发展的方向。关于中学语文教育改革(包括诗歌教学改革)的争论就是在上述的宏观大背景下发生的,说明其有一定的内在必然性。

关于中学语文教育改革争论的具体发端则是起自《北京文学》。该刊 1997 年第 11 期在“世纪观察·忧思中国语文教育”栏目标题下发表了一组文章,包括《女儿的作业》(邹静之)、《中学语文教学手记》(王丽)、《文学教育的悲哀》(薛毅)3 篇文章。“编者按”说:“‘文学教育’在当今社会,越来越受到来自各方面的质疑,而作为‘文学教育’基础的中学语文课,已成为孩子们日益沉重的负担。这一问题正全方位地引起相关学人、教师和学生家长的深切思考。”《北京文学》的文章在社会上引起了颇为强烈的反响,由《光明日报》主办的《文摘报》于 1997 年 12 月 7 日第 8 版用整版篇幅较详细地摘登了这 3 篇文章,《文艺报》1997 年 11 月 19 日和 12 月 13 日先后以较大篇幅发表了有关《北京文学》讨论的报导、述评及争鸣文章,其中 12 月 13 日发表了题为《我不同意这样评价中学语文教育》(吴维)一文,文章认为:中学语文教学的问题是“个别的,极少量的”,“因此在整体上怀疑、非议语文教学则未免失之偏颇了”。《光明日报》1998 年 3 月 11 日发表了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的文章《谈选编中学语文课文的几个问题》。

与此相随,《星星》诗刊从 1999 年第 1 期到第 12 期,开辟了“下世纪学生读什么诗? ——关于中国诗歌教材的讨论”的专栏,《星星》诗刊的讨论又引起了《华夏

诗报》、《新国风》、《中流》等报刊的批评。汕头大学出版社于1999年4月出版了论文集《审视中学语文教育——世纪末的尴尬》(孔庆东、摩罗、余杰主编)。在此期间,出版界还出版了《中国语文教育忧思录》(教育科学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盲点》(中国城市出版社1998年10月出版)等书反映这次语文教育改革的大讨论。

二、关于诗歌教学整体性问题的争论

关于诗歌教学整体性问题的争论,主要围绕着思想性与艺术性、滞后性与时代性、工具性与人文性等重要问题展开。

1. 思想性与艺术性

邹建军说:“究竟是以反映‘革命精神’为着眼点,还是以艺术至上为出发点?是以反映诗史为出发点,还是以诗的文体特性为侧重点?这在以中国少年为对象的中小学教材中,就需要讨论。拿五十至七十年代的诗观来讲,‘分行、押韵、精练、抒情’,这一源自何其芳诗歌定义对诗歌文体特征的概括,在80年代以前是可以被普遍接受的。而纯粹的现代诗人认为,符合以上几个要求的并不一定是诗。”(《调整语文教科书中的诗歌部分很有必要》,《星星》诗刊第10期),邹建军在提出诗歌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矛盾的同时,对一般理解的“艺术性”的内涵亦进行了质疑。

毛翰说:“教科书对文学作品的遴选,实际上一直有一种倾向,就是重思想教化,轻艺术质地。然而,何谓作品的思想性?思想性也包括几十年无大改观的假大空腔调和粉饰太平吗?也包括在百花凋零、饿殍遍野的1959—1961年仍高唱‘祖国的笑容这样美’吗?”“在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数以千万计的同胞无疾而终的年头,祖国怎么还会有笑容?诗人怎么还有如此的好兴致?面对苦难中的中国人民,真正的诗人除了‘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除了‘秋风秋雨愁煞人’,难道还能写出别样情怀的诗句?”(《陈年皇历看不得》,载《星星》第4期)毛翰在提出诗歌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矛盾的同时,则对一般理解的“思想性”的内涵进行了质疑。

女岛说:“这就是我们的教科书,口号式的短句,耶稣化的语气,四书五经般的面孔,一颗又一颗童心永远被照本宣科的声音覆盖着,被酸溜溜的大话假话空话腐蚀着。”(《诗歌教育与新诗危机》,载《星星》第11期)陈良运说:“中小学语文课本诗文的选择,长期以来都坚持‘政治标准第一’的方针,尤其是对于入选的现当代作品。于是政治思想主题明朗而艺术较次甚至很差的作品,乘机进入了语文课本。”(《“诗歌美育”续议》,载《星星》第10期)女、陈二位的语言非常尖锐。

杜华、南野说:“任何艺术都有其方式,无知就无从体会其独特诗境,更不可能进入。20世纪的诗歌在艺术形式上具有更充分的自觉性,因此也更加精粹,它更需要读者必须具备一些诗歌的专门知识。诗不是那种直接诉诸人的原始感官的普

及艺术,诗是语言的特别存在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你得通过语言深入到语言的核心中去,才能到达诗歌。认为70岁文盲老妪都可以读诗,甚至要以适合这一点作为诗的标准,这个流传至今的中国诗坛神话确实应该破解了。”(《当下大学生的新诗经验与姿态》,载《星星》第10期)杜华、南野在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他们关于诗歌“艺术性”的理解。

一些报刊发表文章对上述看法进行反驳和批评。

余之思说:“在《星星》上挥舞的棍棒似乎比较具体地展示了‘先锋’们的理论水平”,“《星星》诗刊的折腾,只不过是‘旧货新摊’而已。教材随时代的进步,社会的需要予以必要的调整,是正常的规律。但我国教材的调整方针必须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而不能相反。”(《论诗坛怪相》,载《重庆晚报》1999年12月12日)

苗得雨说:被《星星》批评的“那些作者在写那些诗时,年龄大都并不比今天一些青年诗人老,他们诗中的精神也至今仍是‘青年’。在我们的课本中,‘青春’没有缺席。新的‘青春’也还会入席,同样也需要教育部门和有关部门进行严选,不是随便什么作品都可以入课本的。”“1999年抗议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那愤怒的吼声来自全国人民,以及全世界正义的人们。对这种惊动全国全民族全世界的大事,有的诗人和刊物表现出的冷漠,让人不解”,“有着这样的冷漠,我想,如再出现当年全民族的抗日战争那样的事,不知还能产生像唤起人们起来战斗的《假如我们不去打仗》和振奋人心的《黄河大合唱》那样众多的作品来吗?那些诗,只有那个时代的擂鼓者才能写出来。”(《也说“陈年皇历”与“滴水不沾”》,载《华夏诗报》1999年10月号)余之思、苗得雨等坚决捍卫诗歌的思想性。

还有论者就语文教材中的新诗为什么缺少艺术性提出了看法。张执诗认为:“我们只要稍稍留意一下现行的语文教材,从小学到大学课本中所收录的‘范文’,便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它们太简单了。因其简单而得以流传,也因其简单而造成了大众普遍的阅读惰性和单一的欣赏趣味。”(《我的看法》载《星星》第9期)另一些论者则主要从诗人创作的角度寻找原因。石天河说:“莫把教材的‘贻误’看得太严重。要知道,田头干了还有长江水,庄稼还是照样长。何必那么‘忧心忡忡’呢?教材改革已经是一个老大难问题了,别说中学,大学的文学理论教材,已经提过很多回了,清风徐来而水波不兴,有什么办法?‘愁痕满地无人省’!诗人最好是管住自己,把诗写好,下一代人就自然会有好诗读。‘雷起于起处’,哲学家比诗人聪明多了。”(《雷起于起处》,载《星星》第9期)女岛说:“诗界谈论这个话题,总以旁观者的姿态呼吁教科书承担一切责任,并用教训的口气抱怨:新诗史上的‘最重要的’‘最壮观的’近20多年来的‘现代诗’,‘在教材中给断代了,隔奶了’;甚至有人非常非常谦虚地说:‘《新中国五十年诗选》选了六七百位诗人的1000多首佳作,我敢说,从中胡乱抽一叠来替换现行语文教材所选新诗,其艺术质量也不会差。’原来这些从70年代‘朦胧’,再经80年代‘先锋’,最后在90年代‘现代’的诗人们,不